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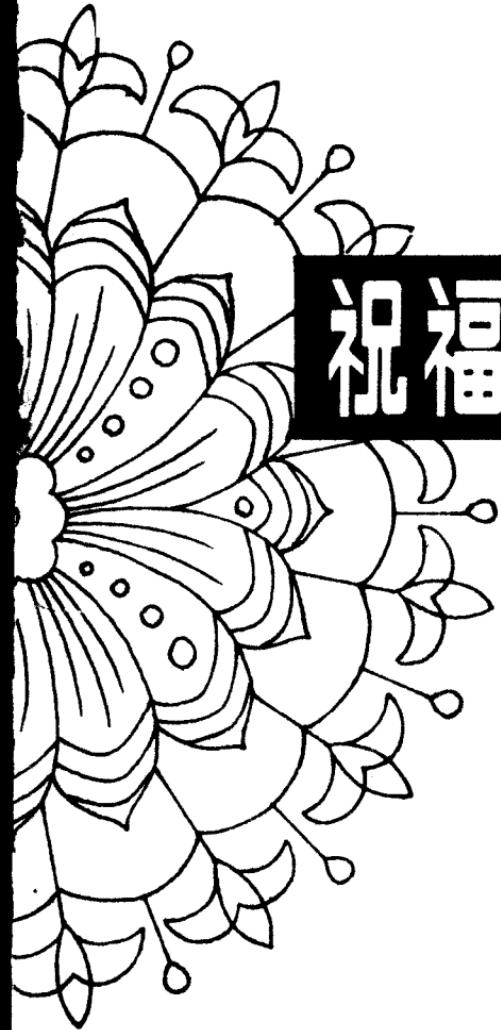


祝福青年一代

陶承

湖南人民出版社

祝福青年一代



内 容 简 介

这个集子汇集了革命老人、《我的一家》的作者陶承同志历年来的诗文。这些作品充满了革命热情，文笔朴实亲切，对于帮助年轻一代提高思想觉悟，继承和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大有益处。集子里的部分文章，重印时，略有修改，并增补了新的内容。

祝福青年一代

(增订本)

陶 承 著

责任编辑：黄起襄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63年5月第1版 1983年12月第4版第5次印刷

字数：135,000 印张：6.75 印数：145,301—278,900

统一书号：10109·769 定价：(平装)0.56元(简易精装)0.62元



陶承同志在写作



革命老人陶承同志近影

目 录

《我的一家》再版前言	(1)
寄自“芙蓉国”的信	(5)
复亲爱青年读者	(12)
致故乡青年	(14)
致故乡观众	(19)
给刚果母亲的信	(23)
附：写给中国妈妈的一封信(刚果一青年)	(25)
给张海迪同志的信(二封)	(28)
附：张海迪同志的复信	(32)
《革命家庭》的通信(十二封)	(34)
祝福青年一代	(53)
毫无利己之心，才是最幸福的人	(61)
永远继承和发扬工人阶级的革命传统	(66)
和青年工人谈前途	(70)
对孩子们的希望	(74)
写给年轻战友的话	(79)
为战斗在祖国边疆的青年们祝福	(83)

星光闪闪的开国纪念章	(87)
除夕喜峰压岁诗	(89)
春节话家常	(91)
怀念周总理对我的关怀和教诲	(93)
记董老二三事	(107)
学习徐老“他人第一”的作风	(113)
谢老鼓励我写书	(115)
怀安诗社杂忆	(119)
革命的母亲，不朽的战士	(133)
何孟雄与我的一家	(152)
火红的青春	
——忆立安	(166)
感怀诗抄(五十七首)	(195)
后　记	(214)

《我的一家》再版前言

一九五五年的春天，正当杜鹃花盛开的时候，我来到了首都北京。

工人出版社的编辑来找我，说是为了向青年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希望我写写我的儿子欧阳立安的革命事迹。

回忆把我带到白色恐怖的年代。那时，革命者在反革命的刀光剑影中坚持着英勇的斗争。饥饿、贫困、被捕、杀头的威胁，动摇不了他们的意志，年深日久，反而磨炼出了一种革命的韧性，任什么力量也压不倒、摧不垮。这种韧性的斗争精神，传给了孩子们。他们从小就懂得人为什么而生，应当怎样生。他们学着父辈的榜样，天不怕，地不怕，想方设法同敌人斗。立安送《大江报》的情景，好象还是昨天的事；梅生对孩子们循循善诱的话语，也仿佛还在我耳边萦绕。但，这已经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啊！

这些回忆，引起了工人出版社同志们的兴趣。他们说，干脆写写你的一家吧。起初我有些犹豫。后来，当我知道写书的目的，既是为了纪念死者，更重要的是为了激励来者的时候，便觉得无法推卸这个责任了。

可我文化水平很低，没写过书，也不懂得怎样写。出

出版社派了编辑给我记录，让我口述。我便顺着年代讲下去，想起什么，就讲什么，断断续续，直到我没得可讲的时候为止。出版社的同志又去访问了和梅生、立安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以及同时代的一些战友，象谢老（觉哉）、廖似光、张金保、涂俊明等同志。为了比较真切地表现那个时代的斗争，他们还查阅了当时地下党办的各种报刊，甚至连三十年代国民党统治地区的各种报纸，也都翻了一遍，为的是从正反两面的材料中得到印证。这些调查研究，这些史料的补充核实，大大弥补了我讲述的不足。当他们整理完一九三〇年的上海那一章的时候，我很高兴地说：这就是当时的上海情况。

书出以后，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真诚地欢迎它。他们给我来信，给出版社写信，表示欢迎这本书，喜欢立安，他们把立安当戚家人，要学习他对革命的忠诚。

不过几个月的功夫，先后有两千多封信寄给了我。这些信来自祖国各地，封封都感情真挚，拿在手里，象捧着一团火。这是广大革命青年的心啊！他们十分懂得革命前辈创业的艰辛，他们想学习前辈的榜样，把自己的满腔热血，也献给壮丽的革命事业。这种崇高的信念，怎么能不令人感动呢？

书的印数，随着读者的需要猛烈激增。很短时间内，就印行了六百多万册，成为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文艺书籍之一。

可是，万万没有料到，这么一本受到广大读者喜爱的书，这么一本薄薄的小书，却招惹了有的人的嫉恨，引来

了“四人帮”对它的杀伐。在“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大棒下，《我的一家》也象许多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一样，被当作“毒草”加以批判，我自己则被当作“专政对象”，被关押了五年半之久。其主要罪证就是说这本书有问题。——早在此书出版不到一年的时候，就有人放过空气，说这本书写的不真实，还把我陶承说成似乎是个骗子手。

开始我还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当“审讯”的人一再向我逼问，要我交代我与徐老、谢老（他们曾为《我的一家》写过序言）以及其他一些老革命家的关系时，我才明白，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对我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的迫害，原来是服从于“四人帮”打倒一大批老革命家的罪恶意图的。

在“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妖氛毒雾中，帮助我整理此书的赵洁同志，也被扣上“反革命黑作家”的大帽子，进行隔离审查、强迫劳动。而根据此书改编的影片《革命家庭》，也被江青扣上种种罪名，诬为“毒草”，横加批判。真是斩尽杀绝。

广大群众用“万恶”两个字来形容“四人帮”，确是非常恰当的。这一伙万恶的妖魔鬼怪，利用窃来的权力，大砍大杀，扼杀了多少美好的事物、优秀的作品和无辜的生命啊！每想至此，我的心里充满了对他们的憎恨。

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做了多方面的认真负责的调查核对之后，决定重新出版这本书了。思前想后，我怎能不感慨万端！这是一本极普通的革命斗争回忆录，其中所写

的主要人物，不过是千千万万革命者当中最平凡的几个。这并不是一本什么了不起的书，但却是用鲜血写出的真实故事。我又一次把它奉献给广大读者。它究竟是不是虚假的东西，是不是毒草，我相信读者同志是能够下判断的。

党中央英明果断，打倒了“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带领着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始了新的长征，为实现我国的四个现代化而奋勇向前。没有党，我这八十六岁的人，怎么能彻底洗刷所蒙受的不白之冤，重新出版这本小书呢？

谁说我已是风烛残年，我现在的心可轻着哩。长征再继志犹在，发白心红老返童。这就是我现在的心境。

又是杜鹃花盛开的季节，我的心，早已飞向那沐浴在明媚阳光下的都城北京，飞向广大热爱这本小书的读者同志。

一九七八年五月于长沙

寄自“芙蓉国”的信

一个到了暮年的人，记忆的仓库里，也还保存着闪光的珍珠。咱们离别十七年，没有通过音讯，好象已经“相忘于江湖”了。但是去年年底一个从北京来的同志对我说，《我的一家》即将重印，还带来你们的问候，于是，一些几乎忘却的往事，又浮上心头，就象你们又站在我面前了。

记得二十三年前，一个夏天，你们工人出版社的同志跑到我家，约我写书。你们诚挚恳切的态度，使我感动了。可是我又觉得好笑：要我描龙绣凤，我是“里手”，因为我确曾拜过湘绣名师；说到写书我可真不知要怎么回答了。不要说遣词造句，就是多写几个字，我也要头晕。你们又提出让我讲述，你们记录。咱们在庭院的藤萝架下，度过了一个夏天，又一个秋天。最后你们又跑图书馆，整整一个冬天，坐在没有炉火的冷屋里，翻阅资料，手冻肿了，脚也冻裂了。——就是因为这个，文化革命中，你们有的同志也被关禁了一年多。谁喜欢做“文字狱”中的主角呢？光是诬蔑屈辱，就可以置人死地了。

我还记得，书出版了，六七万字，薄薄的一本。那是革命江河里涌起的一朵浪花，斗争熔炉里溅起的一粒火星。

但是它却引起了读者强烈的反响，短短几个月，印了六百万册。可是厄运也来了。只因当时窃踞要职的“理论权威”说“是假的，不真实”，《我的一家》就被暗中扼杀了。印好的外文版本也付之一炬。这个权威人士说是假的，有什么根据呢？他说：“我在上海，不知有这个人。”他不知道我，那不奇怪，我这个做“娘姨”的，原是默默无闻。不过，当时我也不知道他，我却不会按照他的逻辑，狂妄地断言：他是不存在的！

从这以后，你们的日子就难过了。一次又一次作检查，写“交代”。你们怕我伤心，不让我知道，还安慰我说，这纯粹是出于误会。其实，我也不以为意，不印就不印吧！

后来，敬爱的周总理说了话：“不是假的，确有此事。”他们还是不让出版。根据《我的一家》改编的电影《革命家庭》拍成了，放映了，那个家伙又跳了出来，责备编剧之一的夏衍同志“不听话”，“你要小心”，“要负责任”。这位“大人物”，可以不听总理的话，他自己的话，别人却非听不可，多么霸道呵！

鲁迅说过：“暗暗的死，在一个人是极其惨苦的事。”还说：“我每当朋友或学生的死，倘不知时日，不知地点，不知死法，总比知道的更悲哀和不安，由此推想那一边，在暗室中毕命于几个屠夫的手里，也一定比当众而死的更寂寞。”当初，我的儿子立安，就是被屠夫们“暗暗”杀害的。而今，在社会主义年代，这样薄薄的一本小书，又被“暗暗”处死了。

现在事情更加清楚了，这个“大人物”，从三十年代起，

就扮演着反复无常的角色。他装出一副“权威”的模样，这也干涉，那也插手，这个作品“反党”，那个剧本“反动”，一不随心，就要加罪。经他点名下放“劳改”的，谁知有多少人？早就闹得怨声载道，民愤难平。对我只说个“不知道”，还算是够开恩的了。

谁知事情并不就此结束，“文化大革命”中，更大的迫害降临了！

一九六八年三月六日，已近黄昏了。我正同孩子玩耍，门外忽然闯进几个人来，为首的一个说：“北京来电，要你到北京去！你以前在上海做地下工作，认识的人很多，很多问题要问你，你要有什么说什么，懂吧！”

我感到问题的严重。这样来势汹汹，不是好兆头，我要求跟亲人告别，但被拒绝了。

当飞机在北京降落的时候，天已很黑了。他们把我弄上汽车，直开到一个公安分局，迎接我的第一个项目是“搜身”。万想不到，我竟这样被捕了！我到底犯了什么罪？面对着七手八脚的搜查，我索性扯断了纽扣，大敞着衣襟，让他们看看，我的心是什么颜色的！

北方三月的深夜，仍是刺骨的严寒，牢房的地上，又湿又冷。躺在一块木板上，盖着一床又破又薄的小被子，我心乱如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呵？！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员怎么被投进监狱？革命者怎么到法庭受审？一定是我们党内出了坏人，一定是的！党呵！你又要遭害了！我要怎样保卫你呢？

第二天过堂，我已做好了充分准备，我要实事求是。

一个坐在上面的人，装腔作势地问：

“这本书是你写的吗？”说着，拍的一声，把一本《我的一家》扔在桌子上。真想不到，原来是为这个！

“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中央都有谁到你家去过？”

“中央有谁帮你写的？”

一连串的问题，接二连三地提出来。这有什么好问的？没有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告诉你们就是了。我才讲了一半，在中间坐着的一个麻子脸，不耐烦地说：

“中央的老人都被你哄了！”

这真是海外奇谈！我哄谁了？我从来没骗过人！我强压着满腔怒火，讲述着事情的真相——而这，并不是他们所需要的。他们咆哮着，拍打着桌子，一次，把两个茶杯盖都震落到地上。

开头每星期过一次堂，以后几个星期过堂一次。三天交一份材料，五日写一份坦白，内容无非还是那一套。每次过堂，都拿着这本书，颠过来倒过去的审问。他们究竟想干什么？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有一点我是明白的，他们想“揪后台”。我说不出后台，他们就说我写书“美化自己”。

我想了想，书里写了什么呢？既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也没有光耀史册的殊勋。它只记下了一个平凡的家庭在革命激流中的动荡生活，大部分还写的是小姊妹间的淘气、友爱，他们有的勇敢，有的脆弱，他们带着自己的优点和弱点，在革命的浪涛中成长。我失去了丈夫，失去了两个儿子，还有两个女儿没有长成，就夭折了。这是我的不幸，

我的悲哀。怎么可以忍心说我是拿自己的痛苦来“沽名钓誉”?当年在龙华牺牲的战士，是人民给他们立了纪念碑。他们是当之无愧的。难道这是我在“美化自己”么?党是我最亲的亲人，如果不是党的引导，我不是也要做“祥林嫂”么?我究竟触犯了谁家的王法呢?

就这样，我莫名其妙地坐了五个半年头的牢!整整两千个日日夜夜，精神上的刺激和病体的折磨，把我搞垮了。

病一天天加重，到一九七三年的夏天，我已经奄奄一息了。他们看看实在挤不出他们需要的东西，就把我送到医院里，可是又怕我死在北京，只得从医院把我弄出来，由公安人员把我押回湖南。一路上不停地打着点滴。我昏迷不醒，什么也不知道。

一九七五年七月，我给敬爱的周总理写信申诉，在他的亲自关怀下，我才获得了自由。

在我被监禁期间，林彪、“四人帮”对影片《革命家庭》也进行了“围剿”。那个“理论权威”那句“要负责任”的话，可不是随便一说，罪名大得怕人，他们说影片是“猛烈地吹捧‘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不学无术，连一点起码的常识都没有。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例如对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这里

说的不是很清楚吗？人民群众反对国民党的压迫，争取政治权利，保障经济利益，怎么就是“左”倾机会主义呢！按照他们的主张，人民大众只有去做蒋介石的“顺民”，而这恰恰是“取消主义”。

他们又瞎说影片鼓吹“资产阶级人情味”。这更荒谬。封建社会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那是“宗法味”，资产阶级社会，人和人的关系是金钱关系，只有“铜臭味”，革命同志之间，互相关怀，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这是无产阶级应有的道德，是高尚的人情味，是应该大大提倡的，怎么竟成了罪过呢？！

他们还说：影片宣扬资产阶级的豪华生活。这是从何说起呢？当时客厅摆设，穿着打扮，都是革命工作的需要。拿我自己来说，过去曾假充“股东太太”，自然不会去住窝棚。可是机关一破坏，我立刻就挨饿！林彪、“四人帮”一伙惯会颠倒黑白，这些披着革命外衣的反革命，生活腐朽糜烂到了极点，却要装得一本正经，真是虚伪透顶、令人作呕！

如今，真正的罪人，终于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中国人民重见天日，扬眉吐气了。我活到今天，得见《我的一家》重新再版，《革命家庭》又和广大观众见面，怎能不高兴呢！二十年过去了。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呢？当年风华正茂的朋友，如今也该满头白发了吧。回忆往事，心潮久久不能平静。

在这朝辉灿烂的“芙蓉国”，高坡岭上一片苍翠，一股蓬勃的生气，使人振奋。遥望郁郁葱葱的远方，更加深了